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  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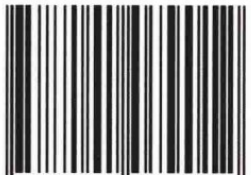
# 晏子春秋

汤化 译注

中华书局



ISBN 978-7-101-07901-2



9 787101 079012 >

定价：35.00元

中华  
经典  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汤化◎译注

# 晏子春秋

中华书局

## 前 言

晏子，名婴，字平仲，一说字仲，谥平，春秋后期齐国人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“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”夷维即今山东高密。晏子之父名晏弱，谥桓子，为齐卿。公元前556年晏弱卒，此后晏子继任齐卿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：“[齐景公]四十八年，与鲁定公好会夹谷，……是岁，晏婴卒。”据此，则晏子卒于公元前500年，先后相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君，长达半个多世纪，其中主要在景公时。以当时齐国局势，大夫专权，田氏势强，景公以昏庸之君，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，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，完全是依赖于晏子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辅佐。他的事迹或传说，除了这部《晏子春秋》外，在先秦两汉其他典籍如《左传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中也有大量生动的记载，所以司马迁曰：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”其崇敬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《晏子春秋》这部书，司马迁就看过。他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中说：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……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……至其书，世多有之。”西汉成帝时，刘向奉旨领校“中秘书”，即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。刘向校书，并作《叙录》，其中就有《晏子》。他在《晏子叙录》中说：“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

参校讎，太史书五篇，臣向书一篇，参书十三篇。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，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”《叙录》是刘向向皇帝汇报他校书情况的奏章，这里就是汇报了当时他所见到的《晏子春秋》的各种版本和他整理校定的过程和结果。从中可见，当时刘向所见到的关于晏子的书，就有多种版本，黄以周认为，所谓“中书”，当即皇家禁中秘书；所谓“外书”，即有别于“中书”的其他藏书。司马迁所看到的，可能就是汉太史所藏的五篇“太史书”。这些版本，篇章或多或少，内容文字或同或异。此外，可能还有许多散藏在私人手中尚未进入秘府而刘向所未见到的。1972年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掘出近五千枚西汉武帝时期的竹简，经专家整理，其中就有《晏子》十六章（一百零二枚竹简），这个本子是否也在刘向所见的“中外书三十篇”之列，不得而知。由此可见，此书至少在西汉初就已流传，司马迁“世多有之”之说是可信的。刘向的《叙录》由其子刘歆汇为《别录》，并在此基础上作《七略》；东汉班固以《七略》为蓝本，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在其中“诸子略”的儒家类之首著录了这本书：“《晏子》八篇。”此后，历代目录学著作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中兴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等均有著录，书名均为“晏子春秋”，有的明言“晏婴撰”，有的不题撰人，卷（篇）数则或七或十二。

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：书名到底是《晏子》还是《晏子春秋》？共有几篇？属于哪一家？作者是谁？成书于什么时候？等等。对于这些问题，前贤今人作了大量的研究，这里无暇备述，只能简要谈谈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下的一管之见。

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，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，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，然后杀青定稿、署名出版。战国之前，私人著述尚未形成风气，古书的形成，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。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，积累渐多，逐渐流传，流传中有人略加整理润色，还会不断有所增加或丢失，如此

几经增损编订，逐渐形成，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。比如《论语》，在孔子生前，“时人弟子各有所记”，孔子死后，再传弟子后学门人也还有许多间接记录，如此积累多了，慢慢汇集成书。有些书还由于流传途径、传授流派多种，会出现各种版本，到最后，各种版本逐渐汇集，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。《晏子春秋》的形成，当亦如此。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，所谓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。晏子作为一代名相，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，民间也必然广为传颂，更有好事者踵事增华，“小说家者流”添枝加叶，所以书中所记，常有与史实不合之处，只是类似于后代的包拯、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东西，可当故事看，难作史料信。由于传播广泛，就可能甲地流传五十则，乙地流传八十则，而丙地则流传二百则，分别有人搜集汇编，于是就出现刘向所见到的各种版本。从其中的思想内容以及好对称、多排比等行文风格看，这些过程多半在战国时期。蒋伯潜说：“按此书非晏子自著，乃后人采其行事，记其言论，纂辑而成，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。”指的就是这些。但这些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成书”。秦火之后，汉初废除“挟书律”，文禁开放，民间献书，各种私藏禁书重见天日，汇集到朝廷秘府，但版本纷繁简牍错乱，所以才有刘向校书之举。《晏子春秋》经刘向集其大成，校核修订，这才算是“成书”了。

如果上述情况大致无误的话，那么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难解决了。关于作者，已如前论，至于有些著录称“晏婴撰”，这显然是不对的。书中始终称“晏子”、“景公”，而我们知道，“晏子”是别人对他的尊称，晏子不会自称“子”；“景公”是谥号，晏子死于景公之前，他根本不知道有此称呼。更何况，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。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。关于书名，古人著书，于书名素不甚讲究。例如《诗经》，原无定名，或称“诗”，或称“三百篇”；司马迁忍辱著书，精思巧构，意欲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，却没想到为这部呕心沥血的传世巨著起个吸引眼球的书名，故世人通称“太史公书”。《晏子》一书，在

当时就不大可能有统一固定的名称，既记载晏子言行，人们或将它类同诸子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等姑以“晏子”称之。至于“春秋”，原为编年史的通名，但也不尽然，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李氏春秋》、《虞氏春秋》等等，均为记载个人言行之书，也称“春秋”，《晏子春秋》当属此类。所以司马迁谓之“晏子春秋”，而刘向、班固则谓之“晏子”。至于篇数，刘向整理为八篇，认为其中六篇合于六经之义，“又有复重，文辞颇异，不复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；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”。后人在传抄中，或根据个人理解，将这些篇目或合并删减，或拆分上下，遂有多种篇目版本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本子，就是八篇（卷）二百一十五章，与刘向所言相同。

但有人认为，司马迁、刘向、班固所见的《晏子春秋》（或《晏子》），早已亡佚，现有的《晏子春秋》，是后人采掇晏子的事迹，依照刘向《叙录》所言体例伪作的，甚至怀疑是六朝人所为。持这种观点的，主要从书中所载之事推断。如讥讽晏子“三心”问题，今本《晏子春秋》的《问下》第二十九章记为梁丘据，《重而异者》第十九章记为高子，而《不合经术者》第三、四章又记为孔子。又如关于齐景公修路寝占人墓地问题，《谏下》第二十章记为逢于何，而《重而异者》第十一章则记为盆成适。再如今本《不合经术者》第四章记孔子到齐国，晏子讥孔子遭桓魋追杀、困于陈蔡之事，而史载此事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时，此时晏子已死。还有一条根据是，司马迁在《管晏列传》中说：“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”，所以在管仲的本传中载了一条《管子》中所没有的管仲论与鲍叔牙之交的“轶事”；以此推断，在晏子的本传中所载的关于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的“轶事”，应当也是《晏子春秋》中所没有的，可是在今本《晏子春秋》中，这两条“轶事”都有，可见今本《晏子春秋》是司马迁所没见到的。这些问题，其实也不难理解。从上述该书产生、传播的情况看，既然有各种不同版本，同一件事情，出现事实有出入、人物各不同的现

象,就都是极为正常的。这种现象即便在传播十分先进发达的现代社会,也还经常发生。且不说《晏子春秋》不是正式的史书,即使如《史记》这样的权威典籍,同一部书中,同一件事情,人物、地点、时间等有出入,也不乏其例。如关于孔子离鲁适卫的时间,《史记》中就有三说:《鲁世家》与《十二诸侯年表·鲁》为鲁定公十二年,《卫世家》与《十二诸侯年表·卫》为鲁定公十三年,而《孔子世家》则为鲁定公十四年。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权威史著尚且如此,又何必计较传说版本众多的《晏子春秋》呢?再说,即使真有三个人都讥讽过晏子有“三心”、齐景公修宫殿占了两个人的墓地,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相反,这种同一事件“版本”不同的情况,正可证明是当时各种传说所记;如果是后人伪作,反倒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尤其是关于孔子陈蔡之事,早有史书明确记载,后人如要伪作,更不可能记成在晏子生前。而关于司马迁的“轶事”问题,如前所论,他所看到的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,其中可能就没有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之事,所以他视为“轶事”。当然也可能这两则是后人增补的。《晏子春秋》虽经刘向整理修订,但是当时既没有如今天这样的印刷术,也没有像“石经”那样不可改动的官定权威版本,《晏子春秋》即便成书,此后也依然全靠手抄转写流传,其间附益删改、分合挪动,也在所难免,但基本上大局已定,断不至于面目全非。依据法律“无罪推定”原理,若无确凿证据,仅凭个别内容有出入,就断定原书已佚、今本为后人伪作,缺乏说服力,难以成论。至于认为作伪者为六朝人的说法,更不见任何根据,只凭“词气”不如、“其文浅薄过甚”之类随便怀疑,更是浅薄之论,不足为信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晏子春秋》列为儒家之首,则认为此书体现的是儒家思想。唐代柳宗元则认为当属墨家。他在《辩〈晏子春秋〉》中说:“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,晏子以俭名于世,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,是皆出墨子,又非孔子,好言鬼事,非儒、明鬼,又出墨子,其言问



枣及古冶子等，尤怪诞，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，此甚显白者。……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。后之录诸子之书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，墨之道也。”此后，属儒属墨，争辩不休。还有人主张列入小说家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将其列入史部传记类。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，但也都有片面性。我们先说历史上的晏子。关于先秦学术“九流十家”之说，是汉代司马谈、刘歆的总结，刘歆、班固在著录先秦典籍时，遂将各书分别纳入既定的“九流十家”框架中。其实，这些诸子流派，在先秦并非骤然形成、壁垒分明。晏子生活在春秋后期，比孔子还略早些，那时，各家思想都只是开始萌芽，尚未形成明显的界限，有些主张，各家共有，有些差别之处，也往往互相影响，互相渗透。所以那时人们的一些言论主张，同时带有后来各家的色彩，是很正常的。而晏子，从他的生平活动看，一生相齐，从事的是十分具体的辅佐君王、治理齐国的政治、外交活动，是个杰出的政治家。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同。思想家如孔子孟子，不事实务，毕生追求远大的理想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往往失败，思想则成为政治家的工具；而政治家，讲求实际、崇尚功利，善于把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化为治国安邦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，而工具，是不拘一格的，不管哪家哪派，有利则用，无利则否，杂各家之道而用之，那么他们某些主张或行为与各家思想有共同之处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再说《晏子春秋》。书中的晏子，又不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晏子。书中的晏子，如主张爱护百姓，重视民心，廉洁节俭，减赋省刑，任贤用能等等，应当说是各家共有的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开明进步的人们的共同愿望。战国之时，儒、墨两家同为“显学”，势力较强。对于晏子这样一位人人称颂的贤相名臣，谁都乐于和他“沾亲带故”，因此在传颂时也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强化其本学派的色彩，于是有些篇章中就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或墨家倾向，引用孔子或墨子称颂的话，这正是本书的形成过程与性质使然，不宜单凭某些内容就认为属于哪一家。

今本《晏子春秋》一书，共八卷，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。内篇即刘向所谓“合于六经之义”者，有六卷：谏上、谏下、问上、问下、杂上、杂下；外篇即刘向所谓“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”，共两卷：重而异者、不合经术者。全书共二百一十五章，各章长者数百字，短者几十字。这些篇章，既有历史上真实的晏子的言论事迹，又杂合了大量民间传说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、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。

书中晏子表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：

重民爱民。自商末周初以来，人们就逐渐认识到“民”对于“天下”的重要性。所谓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（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）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，乃至孟子的千古名言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这种“民本”思想越来越成为进步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共识。这种思想贯穿在《晏子春秋》整部书中，不但体现在绝大部分篇幅里，而且还是其他思想内容的出发点。他和晋国的叔向交谈中，说道：“意莫高于爱民，行莫厚于乐民。”“意莫下于刻民，行莫贱于害身也。”（问下第二十二）因此他主张“先民而后身”（问下第四）。当一位老人祝愿“使君无得罪于民”而引起齐景公不快时，晏子谏道：如果君主有罪于百姓，将有谁来治呢？我斗胆问一句，夏桀、商纣王，是被君主杀的呢？还是被百姓杀的呢？（谏上第十三）

先秦民本思想，还有一个重要特征，即把“民心”与“天意”联系起来，即所谓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（《尚书·秦誓中》），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（《尚书·秦誓下》）。当然，这个“民”的概念是有特定的时代政治内涵的，但随着社会的变革，民本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，到了晏子的时代，它基本上是指广大的平民百姓了。《晏子春秋》有几处记载齐景公想通过祭祀祈祷去祸消灾，晏子都劝谏他要重在得人心，鬼神才保佑，否则祈祷是无用的。如有一次，景公久病不愈，怪罪于祝祷者，想杀了他们以取悦上帝，晏子借题发挥，指出如果祝祷有益，那么诅咒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晏子春秋》汤化译注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74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